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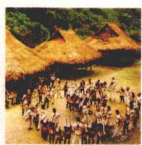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



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探索

——杜玉亭基诺族研究文论

杜玉亭 著



Creative Adoption in the Search for Chinese Ethnology: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Jinuo Research of Du Yuting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

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探索

——杜玉亭基诺族研究文论



Creative Adoption in the Search for Chinese Ethnology: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Jinuo Research of Du Yuting

杜玉亭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探索: 杜玉亭基诺族研究文论 /
杜玉亭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1112-891-8

I. 和… II. 杜… III. 基诺族—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K28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0431号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周元晖

装帧设计: 刘 雨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

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探索

——杜玉亭基诺族研究文论

杜玉亭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耀骏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10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891-8

定 价: 59.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编委会

主 编：尹绍亭 施惟达 瞿明安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京 方 铁 尹绍亭 白志红 杨 慧
沈海梅 张 实 周永坤 施惟达 蔡红华
瞿明安

前 言

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云南大学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从 20 世纪 20 年代云南大学成立时起,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云南大学前进历程中的晴雨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艰难求索后的柳暗花明、名家辈出的辉煌、特殊历史时期的低迷徘徊以及雨过天晴之后的复兴。

20 世纪 30 年代,由方国瑜先生主其事,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探讨民族风俗。并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由方国瑜先生任主任,克服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先后编印“西南文化丛书”十一种。1938 年,吴文藻先生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筹办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先后由吴文藻、费孝通、杨堃等著名学者担任。建系伊始,即注重开展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批民族学、人类学的专著和调查报告。如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樑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费孝通的《禄村农田》,田汝康的《摆夷的摆》,许烺光的《在祖荫下》等论著,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与燕京大学联合,建立了昆明(呈贡)社会学工作站。1940 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出版了《云南大学社会学学报》创刊号,并出版其他刊物多种。这些刊物被译成英文,编入太平洋学会报告及哈佛大学丛书。这一时期的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在国内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大学的师生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





基本弄清了云南省少数民族的族别、语言、人口、分布地域及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等。搜集和积累了有关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近千万字，民族学工作者以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为云南省的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这一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料，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了一批教学与科研的专门人才。国内外民族学界对这一时期云南的民族学发展予以高度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度被取消的民族学学科开始进入一个经历了低迷状态之后的复兴时期，为了恢复和发扬云南大学民族学的优良传统，发展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历史系设置人类学本科专业，1988年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1991年人类学专业在国内率先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1994年，成立中国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开展影视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人类学专业建立民族学硕士点，1997年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1997年10月，云南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正式成立，设置人类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1999年，社会工作专业从人类学系中分出单独建立社会工作系，人类学系原有的人类学专业改为民族学专业。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人类学系建立民族学博士点，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2000年，云南大学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2001年，人类学系所在的人文学院在民族学博士点的基础上获得了人事部授予的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并正式招收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2002年，云南大学在原“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使得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2003年10月，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成立，标志着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促进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发展，云南大学还设立了民族学方向的特聘教授岗位，面向国内外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来担任此职。秉承优良学术传统的民族学工作者撰写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同时，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成功地举办了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美国、德国、荷兰、新西兰、日本、泰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的

十余所大学人类学系同行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并接收国外的进修、实研究生。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和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已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科研和影视制作的一个重要基地。

综观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和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所经历的辉煌、坎坷与复兴，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志、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些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没有扎实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家的研究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贤的成功经验向我们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一朴素的道理。民族学发展史上所取得的每一次突破性进展，无不与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民族志有密切关联。而离开了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民族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句空话。不同风格的专题和个案研究也往往最能体现学者的学术个性和研究特色。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未能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学派一直是几代学人的心结，这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作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实践不够深入恐怕是毋庸置疑的重要原因。要产生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学派，提升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品位，加强民族志、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便是不可或缺的必经途径。我们欣喜地看到，收入民族学文库的研究成果，在民族志、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方国瑜先生曾说，做学问应“不淹没前人，而胜过前人”，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的建设，正是继承民族学优良传统、在前人基础上为学术的进步作出贡献，贻益今人、嘉惠来者的有益之举。作为学术探索，当然不是说收入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瑕不掩瑜，相信历史自会有公道的评判。同时我们也竭诚期待着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以期为民族学的进步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编者

2003年12月





绪论：基诺学路五十年一悟

笔者首次基诺调研是在1958年，时仅23岁，至今年的第31次调研已经74岁，在这由黑发变白发的51年间，已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是：资料2种33万字，文章60多篇近50万字，专著4本64万字，计约147万字，其内容则涵盖了基诺族人文社会的方方面面，且皆有理有据，自成一派，故可谓问心无愧。但回首50年的基诺学路，不禁伸展了宏观的视角，联想到中国古典《论语》中的四个字——“和而不同”。其原因是，孔子2500年前的这四字名言，依然适用于认识现今的基诺族研究。如，笔者基诺研究的学理依据出于西方民族学（以下简称西学），不仅长期认真学纳西学不同学派的学理，更将它们认真应用于民族调研实践，不断融会贯通，这就接近了四字名言中的“和”；至于四字名言中的“不同”，则指笔者在持续田野调研中发现，基诺族富有世所罕见的人类典型文化现象，它们提供了许多新的人文视角，进而对西学学理有所丰富、修正乃至否定。因此，这种“和”与“不同”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基诺族研究的和而不同。正是根据这一理念，笔者认为，上述已发表的基诺族研究成果，可以分为鉴照型与更新型两类，虽然它们都属于民族学中国化的科研成果，却又有以下区别：鉴照型是运用西学原理研究性仿制中国民族学问题的科研成果，更新型是在民族学中国化中对西学有所完善或发展的科研成果，而只有更新型成果才属于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这就是本书提出的一种理念，也可以说是笔者的基诺学路五十年一悟。正是根据这一理念，笔者从147万字基诺研究成果中选出约40万字，并把它们分为有机的八章，其中既有鉴照型文字，又有更新型文字，从而架构了一个可以评鉴和而不同的民族学研究成果的平台。本书所以要突出和而不同的中国民

族学，是因为只有由丰富且非凡的人文资源构成的、和而不同的众多系列性科研成果，才能最终构成在世界民族学中具有独特地位的中国民族学派。

从1958年至2009年的51年间，中国的社会巨变可谓空前绝后，即使笔者偶尔回首民族调研与成果发行一事，也会有梦幻之感。1960年1月至4月云南民族调查组彝族分组为编写《彝族简史》的需要对四川凉山彝族奴隶制进行了一次调查，人员近30人，来自云南、四川、北京等地，其中有吾师杨堃（1901—1998）、方国瑜（1903—1988）等多位师长，但主持此次考察的领导并非其中知名的专家教授，而是大学毕业不足两年的笔者。这在今日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常事，没有任何异议。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之“领导”并非徒具虚名，而是负有全部责任，其中经费的匡算与申请尚不困难，难的是要事先拟出调研提纲、调查点及拟写的专题报告，落实到人后还得去一些调查点具体商询，其间只身翻越凉山腹地大山去牛牛坝调查点时的困境至今记忆犹新，且此时民主改革中的残余叛匪尚未肃清。幸而上天不负苦心人，各点的报告皆如期完成，返昆后笔者又用了数月时间编辑，终于在1962年以《四川及云南昭通地区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为题，内部铅印发行。按今日的学术出版规则，笔者在其中扮演的当之无愧的角色应是田野考察的策划与主持人以及考察资料的编辑与内部发行人。然而，即使今天也感到奇怪的是，在笔者为这本资料写的前言中，虽简述了它的来历，竟没有署上全程负责的杜某人的一个字，署名的编者只是如下的空泛组织：“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办公室”。1962年11月至1963年2月笔者主持的云南小凉山奴隶制调研与资料内部整理编印过程，亦与前者近似。这应是1958年流行的所谓共产主义风格的一种顽强表现。但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术著述的出版规则等也随之大变。因此，笔者作为彝族分组组长主持调研、选编并内部铅印发行的3本彝族资料的命运是：上述全程负责的四川凉山奴隶制调查资料在稍加增益的情况下出版，对杜某人的艰辛劳作一字不提。云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调研资料几乎在没有改动的情況下出版，也未对敌人的辛劳说一句话。当然，笔者对此也无话可说，谁让你被共产风吹得迷迷



模糊，不在自己主持调研编辑铅印内部发行的资料上说明事实真相呢？更为令人难堪的是第三本资料，名为《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年出版，内有笔者1958年至1959年的田野调研资料多种），对杜某人无所提及尚属可忍，而有的竟将笔者写的田野报告置于他人名下，即使从市场运作的角度讲，这也有违知识产权法，然鉴于有关此类丛书发生的剽窃案件诉讼的劳神费时，加上羞于进法院之门的传统积习，特别是想到“大跃进”时代许多调查资料作者并不署名的事实，最终只好长叹一声，吃一堑长一智而已。大概到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才基本懂得并开始运用市场经济下的知识产权。50年调研与成果发行历程的以上回顾，包括本书的50年调研成果，也可谓现代中国社会巨变的一种缩影，当然，从中亦可供读者检验：敝人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

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八章，皆选自50年间发表的文章，它们和而不同的民族学质量到底如何？读者见仁见智，可以自由评说。时跨半个世纪的文字集于一书，不加修饰而全文照录，必有相当一部分时尚气不足，这是它的缺点，然这也有它的长处，那就是免去了后人溢美或误解性文字的失真，不易引起笔墨瓜葛。还由于书中文字存在50年的时境差，今人难得其详，因此，每节最后皆注明其问世时间与出处。每章最后另立一节，名为“本章的参照型与更新型成果因由解析”，对其民族学的和而不同进行解说。八章之后设立第九章，名为“本书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说”，对全书进行学理概括。这一体例设置，或可便于读者顺利解读本书，也有利于不同见解间的相互切磋。又，民族学、人类学二词有一定区别，似又无根本差异，且各国用法不一，故本书依个人习惯主用民族学一词，只在必要时两个概念并用。总之，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是本书初步的学理探索，可否之处，敬希读者赐教。

杜玉亭
2009年6月



目 录

绪 论 基诺学路五十年一悟·····	(1)
第一章 基诺族识别与有关民族理论的探讨·····	(1)
第一节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	(1)
第二节 基诺族族源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	(7)
第三节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 ·····	(19)
第四节 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 思考 ·····	(29)
第五节 本章的鉴照型与更新型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	(43)
第二章 基诺族社会经济研究 ·····	(51)
第一节 基诺人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历史初探 ·····	(51)
第二节 基诺族刀耕火种简论 ·····	(61)
第三节 一种经济形式的典型——基诺族生存经济 ·····	(68)
第四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	(83)
第三章 基诺族历史研究 ·····	(88)
第一节 从基诺族的调查探索血缘家庭的遗迹 ·····	(88)
第二节 基诺族母系制残余及其向父系制的过渡 ·····	(96)
第三节 基诺族的姓名 ·····	(104)
第四节 攸乐城遗址——清朝治理滇南边疆水平的坐标·····	(118)
第五节 基诺族巡礼——大山作伴茶相依·····	(128)



第六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130)
第四章	口传文学与歌唱文化·····	(134)
第一节	阿推——机智人物故事的原型·····	(134)
第二节	巴什——血缘氏族成员间的古老爱情·····	(144)
第三节	与人生过程相伴的歌谣·····	(159)
第四节	基诺族歌唱文化说·····	(193)
第五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204)
第五章	非凡的原始宗教·····	(208)
第一节	基诺族巫师产生的背景层次·····	(208)
第二节	巫师与巫师神女长歌·····	(217)
第三节	人神和谐——基诺族原始宗教概说·····	(230)
第四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245)
第六章	奇异的人生过渡礼仪·····	(248)
第一节	濒危人文微观法与基诺族神秘型诞礼·····	(248)
第二节	成年过渡礼仪的多样性·····	(258)
第三节	传统婚礼例说·····	(268)
第四节	基诺族巴亚寨卓巴丧礼与家屋·····	(288)
第五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308)
第七章	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	(311)
第一节	基诺族恋爱特点与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	(311)
第二节	基诺族传统文化对爱情的建构·····	(325)
第三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333)
第八章	爱心科研成果说·····	(337)
第一节	基诺族村名——地名学瑰宝·····	(337)
第二节	民族文化瑰宝的识别——以基诺族为例·····	(340)



第三节	原始酒文化的现代迷失性错位——兼论基诺族小康 文明建设·····	(349)
第四节	攸乐古茶——原始茶文化品牌·····	(357)
第五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	(362)
第九章	本书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说·····	(366)
第一节	学纳百家, 尊师重道, 贵在实事求是·····	(366)
第二节	融入性全方位持续探索, 学识重积累, 宏微通观求 真知·····	(371)
第三节	本书的和而不同三题·····	(377)
后 记	·····	(382)





第一章 基诺族识别与有关民族理论的探讨

第一节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

基诺人共有1万余人，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今景洪市）的基诺洛克公社。基诺洛克公社是气候温和、特产丰富的亚热带山区，基诺话称之为基诺洛克，汉语旧译称为攸乐山。基诺人民勤劳勇敢、热爱祖国，与当地其他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西南边疆富饶的基诺山区；他们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进行过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基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过了几个历史时代，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7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我们对基诺人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就其民族识别问题报告如下。

一、自称、他称和历史传说

基诺人的自称只有一个，就是“基诺”，汉族称基诺人为“攸乐”，清代历史记载中已有“攸乐”的字样，但这是“基诺”一名的不准确的音译，并无诬蔑之意。傣族称基诺人为“卡诺”，是傣族封建领主对基诺人的一种蔑称，但“诺”字也是对“基诺”的不完全的音译。

基诺人无文字，没有成文的历史。汉文中也没有基诺历史的可靠记载。因此，传说故事便成了解读基诺人历史的重要线索。

基诺人有与云南许多民族大同小异的“洪水泛滥和兄妹成婚”的原始



传说，也有颇具特色的基诺、汉、傣、布朗出于一个大葫芦的神话。这说明，基诺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曾经过原始群婚的时期，他们自古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根据传说和巫师的送魂路线，基诺人是由云南北部南迁到基诺洛克的。

孔明的传说故事在基诺人中广泛流传，人们种的茶树、棉花，甚至住的房子，都被说成是与“孔明老爹”有关，有的老人甚至说基诺人是跟随孔明南征被“丢落”的人，这些说法并非历史真实。但它说明，基诺人早在古代就与汉族人民有着友好往来。从基诺人的传说中还可以看出，基诺人与傣族交往的历史也相当早。

基诺公社石嘴大队的解卓山，是基诺人历史传说中的一个新的起点，自此以后，神话般的传说故事便由天上回到地面。基诺人都知道，解卓山是祖先们最先居住的地方。据说，古时候，解卓山有一个寡妇生了七女七男，之后他们人口繁衍，发展为可以互相通婚的两个姓。后来由于民族间的斗争，他们便到基诺洛克另择新居，第一个姓首先迁到茨通（被人们称为“父寨”）、曼夺（被称为“母寨”），他们又逐渐繁衍出曼雅、窝庄、曼海等13个寨子，这就是攸乐山的前半山。第二姓首先迁到曼坡（“父寨”）和曼飘（“母寨”），后来又分衍出龙帕、曼卡等9寨，这就是攸乐山的后半山。这个传说也有神话的成分，但它却用血缘的纽带把今日的基诺人的具体村寨联系起来，至今解卓山上的土地仍被认为是基诺人共有的地方，被称为“衙巴特缺”。从女性始祖和土地共有的传说看来，基诺人自北方迁居到解卓山时，还处在原始社会。

二、语言

基诺话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据初步了解，基诺话语言内部一致，没有方言分歧，各村寨乡语虽有土语色彩。但并不影响语言交际，都能互相通话。

基诺话的语法构造同藏缅语族基本一致，语音、词汇上同彝语支、缅语支都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语音结构接近彝语支，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也有自己不少的特点。在词汇上就曼雅基诺话与景洪哈尼族（傣尼支系）话1000个词的比较中有90%左右不相同。在语法上与凉山彝语、丽

江纳西语、怒江傈僳语、澜沧拉祜语也有差别。怎样认识基诺话的这些特点，怎样划分基诺话的语支等问题，都有待今后在藏缅语族各语支的语言比较研究中去解决。基诺话的特点是：

1. 以单元音为主；有复音母 pr、p'r、mr、kr、k'r；在汉语、傣语借词的韵母中有韵尾。

2. 词汇以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为主，汉语、傣语借词在词汇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有些借词已渗到词汇中去，具有构造新词的能力。

3. 词序基本上是主语—宾语—谓语，被修饰语在修饰语之前，如汉语“我吃饭”、“白马”、“一本书”在基诺话中应说成“我饭吃”、“马白”、“书一本”。

也有与之相反的词序格式，即主语—谓语—宾语和被修饰语在修饰语之后的，如汉语“我认识他”、“一个人”在基诺话中也是说成“我认识他”、“一个人”，与汉语的词序相同。

此外，还有些代词和名词用声调的交换表示语法上格的变化，比如“我”这个词在句中作主语时用降调，作宾语时用升调。“我打了一下”和“打了我一下”这两句话，前一句的“我”是主格，用“ŋɔɪ”，后一句的“我”是宾格，用“ŋɔɪ”，可见，同一个词因在句子中的作用不同，词的形式也就不同，一个是“ŋɔɪ”一个是“ŋɔɪ”。

三、社会经济

新中成立前基诺人以农业为主，生产上处在“刀耕火种”的落后阶段。土地不固定，每年用一半多的时间砍树刈草，将晒干的草木烧掉后便在灰烬上点种旱谷，一般耕种一两年就要抛荒。有不少水牛和黄牛，但除少数村寨外，都不用牛耕。生产工具主要是一把随身佩带的砍刀、手掌般大的小手锄以及宽约二指播种用的小剃铲。

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新中国成立前基诺人一般只有半年的口粮。因此，他们经常采集和食用的野菜达二三十种，野果达一二十种，人们日常佐餐的汤、菜，基本上是田间劳动中顺便采集的野菜；男子一般都随身带着火枪和箭头带有剧毒的弓弩，猎取从松鼠到野牛之类的动物；妇女在劳动间歇时也常捕捉螃蟹和竹鼠之类的小动物。这应



是基诺历史上经历过原始采集和渔猎生活的一种反映。

作为普洱茶的六大茶山之一，基诺山的采茶业曾在清代繁盛过一个时期，当时曾在基诺山设过茶厂。基诺人种茶树采茶的历史也相当悠久，直至不久前个别富裕的人家还藏有清代的上百两纹银，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部分茶园已经荒芜，茶叶只有靠附近的汉商来采购，以物易物或支付云南地方的半开银币。基诺人内部或与傣族等的商品交换，基本上是以物易物。基诺人内部没有产生专业商人，没有出现与农业完全分离的手工业者。

基诺山区是傣族最高领主召片领的辖区，对这一片世袭领地，傣族土司每年要派官员收取贡赋。尽管召片领名义上是基诺山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但它只作为一种外在的超经济的政治权出现，并不干预基诺人对山区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作为基诺人内部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大致有如下三种：一是以村寨为单位的村社土地占有制；二是以姓氏为单位的氏族占有制；三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占有制。这三种土地占有制形式，各村寨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多数村寨占优势的仍是以姓氏为单位的公有制。原始的土地租佃、买卖已经出现，雇工和高利贷也已发生，贫富分化的结果已产生了个别剥削者。在公有制村寨中，如龙帕寨每年砍树烧山时，则要以姓氏为单位重新分配土地，盛行伙耕伙种，收获时按劳动力平均分配。曼坡寨等则实行以村社公有制定期分配耕地的制度。据说，土地私人占有、租佃和买卖，是在近六七十年发生的，过去整个基诺人地区都实行土地公有，伙耕伙种，平均分配。基诺人仍有一些平均主义的习惯，哪怕是打到一只小鹿子，也要按传统习惯在全村平分。在生产力低下和生活贫困的条件下产生的原始平均主义，也给基诺人带来一些阶级社会见不到的好风尚，比如每人以得到有限的平均一份而满足。大家都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生活。一个很具体的事例是，基诺人房子旁边都有一个传统的竹木结构的小茅屋——私人粮仓，尽管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常缺粮半年，但他们却不会为这唾手可得的粮仓的失窃而担心（至今仍然如此）。

四、社会组织与生活习惯

在基诺人的社会政治组织中，建立在父系家长制基础上的村社长老